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

晚清至民国卷(下编)

蔡乐苏 主编

清华大学专门史系列教材



ISBN 7-302-10840-4



9 787302 108405 >

定价：60.00元(上下编)



清华大学专门史系列教材

中国

思想史

参考资料集

晚清至民国卷（下编）

蔡乐苏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葛兆光先生策划的清华大学专门史教材《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中的一种。本书收录自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关思想史的重要文献,分上下两篇,共九章,每章有总体介绍,下又分若干小节,每节均由四部分组成:首先是“编者按语”,对每一小节涉及的思想史内容提纲挈领作一简要介绍。其次是精选若干“关键文献”,作为了解这一思想史内容的重点资料,并对其作详细的注释,除解释大意外,还附带提供一些有关材料。再次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史料面而安排的“参考文献”,选择摘录若干原始资料,供读者深入了解历史。最后是“参考论著”,选择一些重要的中外相关研究论著,这是为准备更深入研究思想史的读者提供的目录。

本书是为大学人文学科高年级和硕士生所编撰的历史教材,是相关学科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集,也是为有兴趣重新解读中国思想史的读者提供的最佳入门书。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防伪标签采用特殊防伪技术,用户可通过在图案表面涂抹清水,图案消失,水干后图案复现;或将表面膜揭下,放在白纸上用彩笔涂抹,图案在白纸上再现的方法识别真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下编)/张勇,蔡乐苏主编,一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

(清华大学专门史系列教材)

ISBN 7-302-10840-4

I. 中… II. ①张…②蔡… III. 思想史—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508 号

出 版 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客 户 服 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王巧珍

印 刷 者: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发 行 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170×230 印 张:42 插 页:4 字 数:644 千字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10840-4/K·34

印 数:1~4000

定 价:60.00 元(上、下编)

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下编)

目 录

第五章 主义并立的时代	277
第一节 欲动天下者 当动天下之心	277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278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279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282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286
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 共产党之重要讨论》	290
第二节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297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298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	299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	306
蓝公武《社会主义与中国》	311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319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320
李大钊《社会主义释疑》	331
第三节 “好政府”主义及其他	334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	334
丁文江《答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	339
胡适《国际的中国》	343
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	347
章士钊《农村自治》	348
章士钊《注重农村生活》	350

楚图南《单纯的教育改造社会论者可以觉醒了》·····	351
第四节 三民主义新释·····	352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353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礼的演说》·····	356
胡汉民《三民主义之认识》·····	359
第五节 无政府主义·····	363
郑太朴《无政府主义与中国》·····	364
无名氏《均社宣言》·····	370
玄天《往乡村去》·····	372
区声白《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	375
《中国少年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宣言》·····	376
李石曾《政治哲学中之党派观》·····	378
第六节 国家主义·····	381
陈启天《醒狮运动发端》·····	382
曾琦《醒狮歌》·····	384
李璜《释国家主义》·····	385
陈逸凡讲、吴俊升记：《国家主义之今昔观》·····	386
曾琦《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	386
第六章 中国的出路何在？·····	390
第七节 继续革命与消除“五魔”·····	390
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391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	395
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	403
邓演达《中国到那里去？》·····	407
邓演达《政治主张》·····	408
第八节 政治上的出路·····	410
张奚若《政治上的目的与手段》·····	411
罗隆基《论人权》·····	414
华声《党治与民治》·····	418
毕新生《中国政治上的出路》·····	420

张君勱《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	424
王造时《怎样打倒贪污?》·····	427
第九节 现代化讨论·····	434
蒋廷黻《知识阶级与政治》·····	434
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	437
胡适《建国问题引论》·····	446
吴景超《我们没有歧路》·····	451
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	456
章乃器《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与歧路》·····	460
第十节 民治与独裁·····	463
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464
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	475
第十一节 乡村建设·····	479
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	479
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	484
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	486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	489
蒋廷黻《民族主义不够》·····	492
第十二节 “西化”与“本位文化”·····	495
梁实秋《自信力与夸大狂》·····	496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500
叶青《全盘西化?殖民地化?》·····	503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505
常燕生《法家思想的复兴与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	507
第七章 抗战建国与抗战救国·····	513
第十三节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513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	514
陈之迈《中国立国的精神》·····	520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	525
第十四节 文化学术建国·····	528

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	529
胡秋原《中国文化之将来及其复兴之路》·····	535
陈之迈等《艺文丛书总序》·····	538
林同济《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	541
第十五节 以农立国、以工立国及批评·····	544
翁文灏《以农立国 以工建国》·····	545
许涤新《关于中国以何立国的问题》·····	547
第十六节 空喊建国与实际建国·····	558
蒋介石《国民今后努力之方向及建国工作之重点》·····	558
田家英、褚太乙《从旧的专制到新的民主》·····	565
第十七节 民主小姐与法西斯魔鬼·····	573
邓初民《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	573
章乃器《民主建国会政纲》·····	576
张奚若《中国现在害的政治病》·····	582
第八章 借鉴美苏 另辟新途·····	591
第十八节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	591
潘梓年《土地改革与民主运动》·····	592
储安平《中国的政局》·····	593
周绶章《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	604
第十九节 中国应走混合经济之路·····	607
马寅初《中国经济之路》·····	608
许涤新《官僚资本是民主政治的障碍》·····	610
樊弘《两条路》·····	612
第二十节 自由主义者向何处去?·····	616
施复亮《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	617
张东荪《民主化的机关管理序》·····	623
黄炎培《民主化的机关管理自序》·····	626
樊弘《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	628
张奚若《不要辜负了时代》·····	631
第二十一节 潮流与国情 理想与现实·····	632

胡先骕《要顺潮流亦要合国情》·····	633
郭沫若《历史是进化的》·····	637
雷海宗《理想与现实：政治兴趣浓厚时代的两个世界》·····	639
第二十二节 中国经济改造所应预先注意的·····	642
吴景超《经济的改造》·····	643
潘光旦《工业化与人格》·····	647
后记·····	654

第五章 主义并立的时代

自晚清至民初,其实各种主义就已出现,然当时政治之主题在“立宪”与“共和”,主义虽有人宣传,实尚处萌发状态。自新文化运动兴起,至北洋势力倒台,此一时期,就思想史之角度而言,各种主义之并立,乃至为显著之特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好政府”主义、新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等,都有代表人物、理论体系、社团群体、报刊阵地和政治目标。主义的并立,既是历史的要求,亦是时代的产物。辛亥革命的结局、民国初年的犹豫,迫使人们寻找新的精神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已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鸣锣开道;国际势力的渗透及中国内部矛盾的复杂与知识群体的多元取向,种种因素将各色主义酿造出来。主义是旗帜,是目标,它反映出中华民族建立现代国家的进程已迈入理性、自觉的阶段,然而主义的并立,则又预示着前程的艰难与曲折。

第一节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编者按语】

“五四”新文化,在人们的记忆中,“德”、“赛”二位先生的地位自然最高,或者说,“人”的解放最为显要。此二者影响中国现代政治至深且广,毫无疑义。但是,若从另一视角审察“五四”,则“五四”前后之历史转折,更与新主义、新信仰之确立相关。新主义、新

信仰的确立,首先是世界大势之转换,其次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之要求。二势相汇,遂不能再满足于原有意义上的仿西律中与学艺、政制层面的追求。一个要从哲学、伦理学,即宇宙观、价值观高度来解决天下国家前程大计的愿望发生了。青年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提出康、梁、孙、袁均未及大本,而他立志要究大本大源、宇宙真理。陈独秀实际上也是在寻找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提出的口号是“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即是为从哲学上、伦理学上寻求根本改造中国的新工具、新信念,所以他一开始接受的就不是教条的经济决定论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心物两面的改造。这心物两面的改造,可以说是贯穿了毛泽东这位中国20世纪巨人的一生及其整个时代。

毛泽东《致黎锦熙^[1]信》(1917年8月23日)

.....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樛栌^[2]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

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3]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翳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

（《毛泽东早期文稿》，页84~90，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注释】

- [1] 黎锦熙(1890，一作1889—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长沙报馆总编辑，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后到北京，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前后达数十年之久。著名语言学家，曾组织中国国语研究会，主编《汉语辞典》、《增注中华新韵》，著有《新著国语法》、《比较文法》、《国语运动史纲》、《国语新文字论》等书。
- [2] 檣杆，柱上承梁的方形短木，即斗拱。
- [3] 大纛，古代帝王乘舆上用犛牛尾或雉尾制成的饰物。后也指军中或仪仗队的大旗。

【参考文献】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15日)

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

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该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

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

第一当排斥武力政治

以理论言,单独武力,决不能建设现代的国家。以事实言,袁世凯张勋相继以武力政策,都归失败;不但其自己失败,国家也因之到了破产地位;倘有继之者,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现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无论何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顾忌;尚复成何世界!此种武力政治倘不废除,不但共和是个虚名,就是复辟立君,也没有办法;不但宪政不能实行,就是专制皇帝,也没有脸面坐在金銮殿上发号施令。所以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无论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劝他们把这有用的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必定这一层办得到,然后才配开口说到什么政治问题。否则将是无论北洋武人执政也好,西南武人执政也好,终久是个“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有什么政法律之谈呢?(日本楠瀬中将说道:“中国目前最要者,与其谓为南北妥协,宁在改革督军政治;若不改革,即聘百顾问,亦终难改善国政”,这话可算说得切中要害。)

第二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

现在世界各国中,像德意志虽说是以普鲁士为中心势力统一联邦,像日本虽说是以萨长军阀为中心势力统一三岛;但是德意志各联邦,也不是事事仰普鲁士的鼻息;德日各政党盘踞之国会,都有绝大的威权,也非普鲁士及萨长军人可以任意指挥,随便破坏的;况且近年以来,普鲁士及萨长军阀的威权,也都有日渐收缩之势了。试问我们中国那一党人那一派人,配说有普鲁士或萨长军阀的勋劳和实力呢?袁世凯以数十年的辛苦经营,尚且不能以一派势力统一国家;其余各党各派的内容(部),都是四分五裂,本身尚不能统一,如何当作统一全国的中心势力呢?这种迷梦倘不打破,各派人都想拿自己之势力来统一中国,而各派都统一不成;即使一时成功,也断断不能

持久；互想统一，互夺政权，争夺不休，必至外国人来统一而后已。所以我始终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又赞成一党组织内阁的梦想。我们中国人无论何党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让敌党执政的雅量，实在缺乏的狠。老实说一句，一碗饭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独吃，势必大家争夺，将饭碗打破，一个人也吃不成。

第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譬如既然想改用立宪共和制度，就应该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的精神；什么大权政治，什么天神，什么圣王，都应该抛弃。若觉得神权君权为无上治术，那共和立宪，便不值一文。又如相信世间万事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中国目下一方面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采唱（倡）尊君的孔教，梦想大权政治，反对民权；一方面设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唱（倡）非科学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说；一方面提唱（倡）西洋实验的医学，一方面又相信三焦（编者按：中医学名词，即膈以上曰上焦；脐以上曰中焦；脐以下曰下焦。此三焦有主持诸气的作用。），丹田，静坐，运气，的卫生；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

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我们中国，已经被历代悖谬的学说败坏得不成样子了。目下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暗云密布，也都有几种悖谬学说在那里作祟。慢说一班老腐败了，就是头脑不清的青年，也往往为悖谬学说所惑；我所以放胆一言，以促我青年之猛醒！

（《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页1~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1919年5月)

.....

……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经济现象虽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全社会的表面构造(如法律、政治、伦理、及种种理想上,精神上的现象都是),但这些构造中的那一个也不能影响他一点。受人类意思(识)的影响,在他是永远不能的。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识),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法律他是人类的综合意思(识)中最直接的表示,也只能受经济现象的影响,不能与丝毫的影响于经济现象。换言之,就是经济现象只能由他一面与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而不能与其他社会现象发生相互的影响,或单受别的社会现象的影响。

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但这经济构造的本身,又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

这最高动因究为何物,却又因人而异。Loria 所认为最高动因的,是人口的稠庶。人口不断的增加,曾经决定过去四个联(连)续的根本状态:就是集合,奴隶所有,奴仆, Servile 佣工。以后将次发生的现象,也该由此决定。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其他学者所认为最高动因的,又为他物。但他们有一个根本相同的论点:就是,经济的构造,依他内部的势力,自己进化,渐于适应的状态中,变更全社会的表面构造;此等表面构造,无论用何方法,不能影响到他这一方面,就是这表面构造中最重要法律,也不能与他以丝毫的影响。

.....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页 525 ~ 526)

.....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他却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意识，主义，思想，使他们必须适应他的行程。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是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可是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而这在旧社会组织内，长成他那生存条件的新社会组织，非到自然脱离母胎，有了独立生存的运命，也是万万不能发生。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

以上是马克思独特的唯物史观。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530～531页）

与他的唯物力（史）观狠（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

.....

……我们看那马克思与昂格思的《共产者宣言》中“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级）竞争的历史”的话，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批评》序文中，也说“从来的历史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种种形式——中进行的”，就可以证明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了。

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

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这个倾向,斯宾塞谓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他在《社会学研究》中说,“个人的利己心引出由他们作成的阶级的利己心;于分别的努力以外,还要发生一种协同的努力,去从那社会活动的总收入中,取些过度的领分。这种综合的倾向,在每阶级中这样发展,必须由其他诸阶级类似的综合的倾向来维持其平衡”。由此以观,这阶级竞争在社会的有机体中,恰与 Wilhelm Roux 所发见(现)的“各不同的部分官能组织细胞间的竞争,在各有机体中进行不已”,的原则相当。宇宙间一切生命都向“自己发展”Self-expansion 活动不已。“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而在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社会为什么呈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马氏的意见以为全是因为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余工余值说详后)的原故。但这两种阶级,最初不过对于他一阶级,可称一个阶级,实则阶级的本身还没有成个阶级,还没有阶级的自觉。后来属于一阶级的,知道他们对于别的阶级,到底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命运,就是有了阶级的自觉,阶级间就起了竞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这样看来,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与其说他的阶级竞争说是他的唯物史观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

.....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页 531 ~ 533)